

上海盟军战俘营考略^{*}

张 帅 苏智良

摘 要：太平洋战争期间，为了管理盟军战俘、消除中国民众对英美等国援助抗战的期望，同时为上海的驻军提供劳动力资源，日军设置了上海盟军战俘营。自1942年1月至1945年5月，1000余名来自威克岛、华北海军陆战队等地的盟军战俘被关押于此战俘营。日方对盟军战俘非常野蛮，盟军战俘遭受寒冷、饥饿、酷刑、强迫劳动等痛苦折磨。虽然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但由于战俘营配备一定的医疗设施，红十字会及旅沪侨民积极援助，以及盟军战俘尽力保持严格军纪，上海盟军战俘营保持了较低的死亡率。日军原本想将上海盟军战俘营作为其善待战俘的展示橱窗，实际反倒成了其践踏国际人道主义、实施战争犯罪的见证。

关键词：战俘营 上海 盟军 太平洋战争

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对威克岛、关岛、香港、东南亚地区发动突袭，俘虏了大量盟军士兵。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俘虏英、美、荷、澳等白人战俘125309人，非白人战俘162226人。^①为了管理这些战俘，日方开始设置战俘营，并逐渐完备战俘管理制度。1941年12月23日，日政府公布了《俘虏收容所令》（敕令第1182号），规定战俘营由陆军省管辖。^②27日，日方公布了《俘虏情报局官制》，规定俘虏情报局负责战俘的收容、押送、交换、医疗诸事项，陆军少将上村干男被任命为俘虏情报局首任长官。^③此后，日方又制定了97份涉及俘虏收容、管理、转运、通讯、劳务等内容的文件。^④

1942年1月15日，日本在善通寺设立了第一个盟军战俘营。^⑤依据日方的资料，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设置的盟军战俘营共18处。日本本土有8处：善通寺、大阪、仙台、东京、名古屋、函馆、广岛、福冈；占领区有10处：上海、台湾、香港、奉天（今沈阳）、朝鲜、爪哇、

*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3&ZD094）、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资助项目“上海盟军战俘营研究”之中期成果。

① 内海愛子、永井均：《東京裁判資料——俘虜情報局關係文書》，東京：現代史料出版，1999年，第25頁。

② 内海愛子：《日本軍の捕虜政策》，東京：青木書店，2005年，第169頁。

③ 内海愛子、永井均：《東京裁判資料——俘虜情報局關係文書》，第20頁。

④ 王铁军、高建：《二战时期沈阳盟军战俘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53頁。

⑤ 秦郁彦编：《日本海陆军综合事典》，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转引自王铁军、高建：《二战时期沈阳盟军战俘营研究》，第55頁。

泰国、菲律宾、马来亚、婆罗洲。^①根据以上史料，日军在中国先后设置了香港战俘营（1942年1月31日）、上海战俘营（1942年2月1日）、台湾战俘营（1942年7月7日）、奉天战俘营（1942年12月16日）。此外，日军在海南岛设置关押澳大利亚、荷兰等国战俘的劳役作业场。日方史料中未出现海南岛战俘营的正式名称，然而就其实质而言，此地亦是一处战俘营。

国外学界很早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中日军关押的盟军战俘进行研究。战争结束后就陆续有回忆录资料问世。这些回忆录是盟军战俘对苦难生活的记忆，从个体角度来记述、还原战俘营状况。^②随着回忆资料的不断出现，美国学界开始探讨二战日军战俘营的设置、管理等问题，尤其是战俘的苦难生活问题，^③并且开始分析日军残酷对待战俘的原因。^④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战俘劳工问题、^⑤战俘医疗问题^⑥也得到了学界关注。然而，根据笔者所知，欧美学界对日军战俘营的研究多集中于日本本土及东南亚地区，对设置于中国的盟军战俘营关注较少。

日本学者的研究经历了由档案文献搜集整理到俘虏政策研究的过程。茶园义男的《大东亚战下外地俘虏收容所》整理了日本战时设置战俘营的档案资料。^⑦内海爱子、永井均的《东京审判资料——俘虏情报局关系文书》是对战后审判中有关战俘问题的档案整理。内海爱子的《日本军队的俘虏政策》从档案整理深入到政策研究，分析甲午战争以来的日本俘虏政策，重点讨论二战期间日本的战俘管理政策。无论是资料收集还是政策分析，日本的盟军战俘营问题研究尚未专门涉及上海盟军战俘营这一论题。

- ① 《收容所及人员表》，1942年12月，《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交戦国間敵国人及俘虏取扱振關係/帝国権下敵国人關係 第一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2032539600。
- ② 回忆录资料包括：Robert Woodrow Levering, *Horror Trek: A True Story of Bataan, the Death March and Three and One-Half Years in Japanese Prison Camps*, Dayton, Ohio: Horstman Print. Co., 1948;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47; 等等。
- ③ Charles G. Roland 探讨了日军管理下盟军战俘大量死亡的事实（Charles G. Roland, "Stripping Away the Veneer: P. O. W. Survival in the Far East as an Index of Cultural Atavism,"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53, no. 1 (Jan. 1989), pp. 79-94); R. G. S. Whitfield 将日军战俘营按食物供应分成两个时期：白米时代（1942年1—12月）和大麦、豆类时代（1942年12月—1945年5月）（R. G. S. Whitfield, "Anomalous Manifestations of Malnutrition in Japanese Prison Camps,"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2, no. 4517 (Aug. 1947), pp. 164-168）。
- ④ S. P. MacKenzie 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流行的民族主义加深了对外国人的憎恨，所以日本军队普遍虐待盟军战俘（S. P. MacKenzie,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in World War II,"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6, no. 3 (Sep. 1994), pp. 487-520）。
- ⑤ Gerald H. Davis 认为 20 世纪战争中，战俘为关押国修筑军事工事，承担了大量劳动（Gerald H. Davis, "Prisoners of War in Twentieth-Century War Econom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12, no. 4 (Oct. 1977), pp. 623-634); Howard S. Levie 分析了二战中日军使用战俘劳工问题（Howard S. Levie, "The Employ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7, no. 2 (Apr. 1963), pp. 318-353）。
- ⑥ Rosalind Hearder 描写了医生战俘的生活（Rosalind Hearder, "More Complex than a Stereotype: Australian POW Doctors and the Japanese in Captivity, 1942-45," *Health and History*, vol. 6, no. 2, Military Medicine (2004), pp. 75-91); John A. Glusman 也记述了被俘医疗人员的战俘经历（John A. Glusman, *Conduct Under Fire: Four American Doctors and Their Fight for Life as 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 1941-1945*, New York: Viking, 2005）。
- ⑦ 茶园義男：《大東亜戦下外地俘虏收容所》，東京：不二出版，1987 年。

国内学者对沈阳的盟军战俘营已经作了系统研究,而对上海、台湾、香港盟军战俘营的关注不足。^①杨竞认为沈阳盟军战俘营是“日军实施以战养战策略的结果”、“以高度专业化、高死亡率和高级将领战俘在押为特征”。^②焦润明、王铁军利用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档案对沈阳盟军战俘营的信函检查制度进行研究,认为日方试图通过对英美战俘的邮件和信函检查来获取美国的相关情报,情报内容包括美国国内的战争动员、战争宣传、战争态度、参军参战动向、盟军战机型号、美军空袭作战方式、对俘政策等。^③综合国内外研究可知,学界对上海盟军战俘营的研究尚显不足。上海盟军战俘营的设置情况如何?战俘来源于何处?日方如何管理战俘营?盟军战俘在上海的生活状况如何?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近年来,学者开始对上海盟军战俘营进行研究,但是由于档案资料发掘不够,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入。^④本文以战后美国战俘情报局(American Prisoner of War Information Bureau)对上海盟军战俘营的调查档案为主,辅以日方档案、中国报纸等文献资料的相关记录,试图展现上海盟军战俘营的历史图景。^⑤

一、上海盟军战俘营的设置及战俘组成

上海盟军战俘营关押的战俘主要来自威克岛战役被俘的美军官兵及平民。1941年12月23日,日军攻占马绍尔群岛中的威克岛,1000多名美国军人和建筑工人沦为日军俘虏;1942年1月12日,除留下部分战俘在该岛继续修筑军事工事以外,约1200人被强令登上“新田丸”

① 国内关于台湾盟军战俘营的研究,参见钟淑敏:《俘虏收容所——近代台湾史的一段悲歌》,曹永和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曹永和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台北:乐学书局,2001年,第261—288页;张晴、何麦克:《揭秘台湾战俘营》,井晓光、王建学、李永璞主编:《中国及太平洋抗战与战俘问题研究——中国及太平洋抗战与战俘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2—160页;叶樱:《二战时期台湾盟军战俘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2年。笔者尚未发现有关香港盟军战俘营的中文作品。有关香港盟军战俘营的英文研究,参见Daniel G. Dancocks, *In Enemy Hands: Canadian Prisoners of War 1939-45*, Edmonton: Hurtig Publishers Ltd., 1983; Tony Banham,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Press, 2003; Charles G. Roland, *Long Night's Journey into Day: Prisoners of War in Hong Kong and Japan, 1941-1945*,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等等。

② 杨竞:《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考略》,《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96页。

③ 焦润明、王铁军:《日军“奉天俘虏收容所”的信函检查与对美情报收集》,《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84页。

④ 有关上海盟军战俘营的研究,参见陈正卿:《美军战俘画笔下的宝山集中营》,《世纪》2005年第5期。笔者在实地调查上海盟军战俘营的过程中,得到何天义、陈正卿等前辈学者的指导与帮助,在此感谢。

⑤ 研究上海盟军战俘营,日方的管理档案尤为关键。然而,按照日本当局的要求,战俘营管理当局在战争结束之时将大量档案销毁。1945年8月20日,日军大本营曾向战俘营所在地的日军发送绝密文件:“对于曾经虐待过俘虏和在押军人的人员,或俘虏对其极度反感的人员允许帮助他们迅速转移,或在不留线索的前提下予以遣散。此外,对于落入敌方手中后将对我方产生不利影响的文件应按照秘密文件的处理方式处置,用完后进行销毁。”(参见杨竞编著:《奉天涅槃: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盟军战俘营》,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年,第227页)战俘营的文件涉及日军对战俘的管理、虐待等,属于应当处理、销毁的文件。在战争结束之时,“多达70%的战时档案要么被烧毁要么被用其他手段毁掉。”(Edward Drea, et al., *Researching Japanese War Crimes Records: Introductory Essays*,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for the 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Washington, DC, 2006, p. 9)笔者目前尚未发现日方记录的上海盟军战俘营直接档案,只是在日方俘虏情报局档案中,发现对上海盟军战俘营的相关记录。

(Nitta-Maru) 客轮，绝大部分战俘被运到上海盟军战俘营。^①

太平洋战争时的盟军战俘大都经历了梦魇般的海上航行。“运输船上的惨状远远超出了战俘们的想象，严酷的高温、难闻的恶臭、过度的拥挤，加之缺食脱水、日本看守的肆意殴打，使得战俘们再也不愿去回忆那样的旅程”。^②“新田丸”虽是日本邮船公司制造的豪华客轮，但威克岛战俘的转运之路却充满痛苦。“在登陆船上就看到了那艘将带我们驶向中国的灰色战俘船”，在密封的船舱中，“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 12 天”。^③据战俘回忆，“新田丸”上的待遇很差，“住的地方没有窗户，船上也没有水槽，只有稻草中到处乱爬的吸血小虫”。^④在航行过程中，有 5 名战俘——富兰克林·西奥多 (Franklin Theodore)、约翰·兰伯特 (John W. Lambert)、罗伊·冈萨雷斯 (Roy H. Gonzales)、厄尔·汉纳姆 (Earl R. Hannum)、文森特·贝利 (Vincent W. Bailey) 被日军砍头，身体被肢解后扔入大海。^⑤

1942 年 1 月 18 日，“新田丸”运载包括指挥官坎宁安 (Winfield Scott Cunningham) 在内的美军战俘到达横滨。在短暂的停留中，海军陆战队的普特南少校 (Putnam)、波特少校 (Potter)、克雷沃上尉 (Kliwer)、炮手博思 (Borth)、海军指挥官基恩 (Keene)、奥尔科特 (Olcott)、亨肖 (Henshaw)、劳弗 (Lauff) 及另外 12 名士兵被带走，战俘的个人财物亦被没收。^⑥停留一天后，“新田丸”从横滨出发，23 日抵达上海。从此，威克岛战俘开始了在上海三年多的囚徒生活。

日军在上海设置的盟军战俘营主要有两处：吴淞盟军战俘营和江湾盟军战俘营，这两个战俘营存在时间上的承继关系，战俘营管理者亦相同，共同构成了“上海盟军战俘营” (Shanghai War Prisoner Camp)，日方称为“上海俘虏收容所”。^⑦吴淞盟军战俘营“曾经是日军的一处兵营，位于上海以北 15 英里处，距离吴淞炮台 5 英里”。^⑧根据学者的调查，该战俘营位于长江边上，是今上海宝山吴淞公园后海军博物馆之一部分。^⑨1942 年 12 月 6 日，上海盟军战俘营由吴淞转移到江湾高境庙乡。据美方档案记载，江湾盟军战俘营“坐落在上海北郊的江湾镇，修建在一个比较干燥的高地上，距离上海一个小时的车程”，具体坐标为“北纬 31 度 18 分，东经

① Reba Wilkerson, “Wake’s Forgotten Survivors,” *American History Illustrated*, vol. xxii, no. 8 (Dec. 1987), pp. 43, 44.

② Kelly E. Crager, *Hell under the Rising Sun: Texan POWs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Burma-Thailand Death Railway*, Texas: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7.

③ Joseph J. Astarita, *Sketihes of P. O. W. Life*, zürich: Rollo Press, 1947, p. 12; Reba Wilkerson, “Wake’s Forgotten Survivors,” p. 44.

④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14.

⑤ Jim Moran, *Wake Island 1941: A Battle to Make the Gods Weep*,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11, p. 88.

⑥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15.

⑦ 除了吴淞和江湾，日军在上海关押盟军战俘的地点还有提篮桥监狱 (Bridge House Jail, 今四川北路 85 号)、海军战俘营 (Naval Camp, 今东江湾路 15 号)、华德路监狱 (Ward Road Jail, 今长阳路 147 号)。这些地点都是零星关押盟军战俘，只有吴淞和江湾战俘营长期关押成建制的盟军战俘。此外，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上海还设置有盟国侨民战俘营，例如龙华集中营 (沪闵公路上海中学旧址)、闸北营 (中山路大夏大学旧址) 等。在一些档案中，盟军战俘营和侨民营未作区分，统称“外侨营”等，本文研究对象只包括盟军战俘营。

⑧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31 July, 1946, 4-4.5A-AB-C2-693, Historical Manuscript File, p. 22.

⑨ 陈正卿：《美军战俘画笔下的宝山集中营》，《世纪》2005 年第 5 期，第 38 页。

121度28分”。^①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该战俘营旧址位于今宝山区殷高路15号,现为上海市高境强制隔离戒毒所。

上海盟军战俘营设立于1942年2月1日。^②3月28日,上海盟军战俘营收押盟军战俘1541人。^③在这些战俘中,威克岛战俘占据了绝大部分。除此之外,上海盟军战俘营关押的战俘还包括以下部分:一是英美等国驻上海的海军战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要求停驻在上海的美国炮舰“威克号”(the USS “Wake”)、英国炮舰“海燕号”(the HMS “Petrel”)投降。“威克号”是美国海军的一艘内河炮舰,负责保护往来于长江流域的美国使团,日本实施全面侵华之后,该炮舰还负责监视日本军队在长江流域的行动。在1941年11月底美舰“吕宋号”(Luzon)和“瓦胡号”(Oahu)驶离上海前往马尼拉后,“威克号”成为美国海军长江巡航队(The American Navy's Yangtze River Patrol)唯一的在华舰只。12月8日凌晨4时,日军发起对“威克号”的进攻,船员未及反抗便被日军制服,该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唯一一艘未经抵抗就被完好俘获的海军舰只”。^④日军发起进攻时,舰长哥伦布·史密斯(Columbus Smith)还在岸上公寓中,后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被俘。英舰“海燕号”拒绝投降,被日舰“出云号”击沉。舰上的英军“于舰已着火时,跃入浦江,溺水至法租界罗斯福码头,被日兵俘获”。^⑤两舰被俘的海军士兵被日军临时关押在虹口北江湾路海军战俘营(Naval Prisoner of War Camp, Shanghai, China)。^⑥威克岛战俘被运抵上海时,“威克号”舰长史密斯得到日本海军的允许,亦到“新田丸”停泊的公和祥码头迎接威克岛战俘。后来,两舰被俘的美英官兵同威克岛战俘一起,被关押于吴淞盟军战俘营。二是美国驻华北的海军陆战队官兵(North China Marines)。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分别驻扎在北平、天津和秦皇岛,三地被俘官兵分别为205人、36人、21人。^⑦该部原计划于1941年12月10日驶离中国前往菲律宾,其武器和随身物品已经被提前运至秦皇岛,只待出发。然而,12月8日晨,三地的海军陆战队官兵被日军包围。北平驻军在威廉·阿什赫斯特上校(William Ashurst)的命令下投降,1942年1月10日被日军押送至天津海军陆战队兵营,同天津、秦皇岛战俘会合。1月28日这批战俘被押送离开天津,于2月1日到达上海吴淞盟军战俘营。^⑧1942年11月,这批战俘中约70名被转运至日本九州岛。^⑨三是部分被捕的盟军飞行员。1943年10月13日,服役于第14航空队23大队75中队的中国籍成员陈炳靖奉命驾驶P-40飞机执行护航任务,战机在越南坠毁后被俘,后被关押

①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3.

② 内海愛子:《日本軍の捕虜政策》,第200頁。

③ 《俘虜情報局月報》第2号,1942年3月28日,《大東亜戦争關係一件/交戦国間敵国人及俘虜取扱振關係/帝国権下敵国人關係 第一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B02032536500。

④ H. Grover and Gretchen G. Grover, “Night Attack at Shanghai,” *Naval History*, vol. 5, no. 4 (Winter 1991), p. 37, 转引自华百纳:《上海秘密战》,周书珪、周育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108页。

⑤ 《韦克岛被俘美军 拘留沪郊集中营 共一千余名系由横滨来沪》,《申报》1942年1月25日,第4版。

⑥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4.

⑦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9.

⑧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p. 19, 21, 22.

⑨ <http://www.northchinamarines.com/index.htm>.

于上海盟军战俘营。^①1945年5月，在日军将关押在上海的盟军战俘转运至北京丰台途中，飞虎队员毕晓普（Bishop）成功脱离虎口。^②四是少数被俘的盟军高级将领及其他人员。英国驻香港总督杨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曾被关押于上海盟军战俘营。杨慕琦在关押期间遭受战俘营翻译官石原勇（Isami Ishihara）的虐待，美国驻天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布朗少校（Luther A. Brown）帮其免于酷刑。^③此外，正如表1所示，上海盟军战俘营还关押有其他国家战俘，1942年到1945年的收押人数分别为26人、36人、79人、2人。在日方的统计资料中，“其他国家战俘”是指除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之外的战俘，至于具体为哪些国家，尚不能完全确定。^④

上海盟军战俘营关押的战俘总数随时间发生变化。如表1所示，1942到1944年关押的战俘数分别为1484人、980人、1023人。由于战场形势变化，1945年5月，日方将上海的盟军战俘转移至北京丰台。5月4日，盟军战俘中100名木匠、电工等被先期转运到丰台，5月9日，上海盟军战俘营关闭。剩余的20余名战俘因为身体不适被送往上海市属警察医院（Municipal Police Hospital in Shanghai），其中部分康复后被转运至丰台，其余战俘在上海迎来了解放之日。^⑤

表1 上海战俘营收容盟军战俘一览表

时间		美	英	其他	合计
1942	将校军官	38	4		42
	普通官兵	557	42		599
	非军人	784	33	26	843
	合计	1379	79	26	1484
1943	将校军官	44	4		48
	普通官兵	381	36	29	446
	非军人	452	27	7	486
	合计	877	67	36	980
1944	将校军官	48	4	10	62
	普通官兵	380	36	62	478
	非军人	449	27	7	483
	合计	877	67	79	1023
1945	将校军官			1	1
	普通官兵	10	1	1	12
	非军人	11			11
	合计	21	1	2	24

资料来源：茶園義男：《大東亞戰下外地俘虜收容所》，第24頁。

表1中出现的“非军人”一项包括威克岛战役被俘的美国平民建筑工人。美方资料证明，

① 刘小童：《远去的飞鹰——飞虎队里唯一的中国人陈炳靖》，《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7月2日，http://www.nfpeople.com/story__view.php?id=3263。

②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35.

③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19. 杨慕琦亦曾被关押于沈阳盟军战俘营，见杨竟：《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考略》，《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03页。

④ 表1是根据日方档案资料所作，在原档案上海栏中，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项目数字为0，笔者在制作表格时省略了这三国，故这里的“其他”是除美、英、荷、加、澳等国之外的战俘。

⑤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8.

上海盟军战俘营设置初期关押有 700 多名来自威克岛上的平民战俘。^①二战期间,日本将战场上俘获的敌对国家人员均视为战俘。虽然有“非军人”的区分,但是在管理上“日军将威克岛所有人视为战俘,包括平民建筑工人”。^②

上海盟军战俘营中关押的战俘具有流动性。在战俘营设立的四年中,不断有盟军战俘被收押或者释放。根据日方档案,1942 年上海盟军战俘营共释放 36 人,包括美国军人 5 名,英国军人 22 名,加拿大军人 2 名,此外还有 7 名英国非军人战俘。1943 年释放 201 人,1944 年仅释放 1 人。三年间,上海战俘营总共释放士兵 228 人,平民 10 人,共计 238 人。^③日军出于什么目的释放战俘?是其战俘管理政策的规定,还是由于战俘的个人原因,笔者尚未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过,太平洋战争期间美日曾经达成遣返平民协议,1942 年 6 月达成的遣返协议允许 639 名美国人以及一些加拿大人和少数南美洲国家的公民离开上海,这些人乘坐意大利邮轮“维尔代伯爵号”(Conte Verde)前往葡属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④在这批被释放的平民中,兼有盟军战俘。《申报》记载“附属于驻沪美总领事署之美海军陆战队,有五名已从上海俘虏营释出,将随第一批遣返美侨搭康铁凡第号(即上文 Conte Verde 的音译——引者注)撤往洛伦柯马基斯(即上文的洛伦索-马贵斯——引者注)”。^⑤据战俘回忆,他们当时就知道拥有外交身份的战俘会被遣返。德弗罗上校(James P. S. Devereux)就找到曾以临时外交人员身份同日军交涉物资问题的钱德勒(Clerk Paul Chandler)中校,希望后者将威克岛战役的情况介绍带回美国。

除去释放,调配及死亡也导致战俘数目发生变化。1942 年 9 月 18 日,上海盟军战俘营中的 70 名战俘被转送日本。^⑥1943 年 8 月 20 日和 11 月 11 日,分别有 200 余名和 150 名战俘被转运日本。^⑦据日方资料统计,1942 年上海盟军战俘营死亡 26 人;1943 年死亡平民战俘 3 人;1944 年死亡 8 人;1945 年死亡 3 人;在整个关押期间,盟军战俘共死亡 40 人。^⑧根据这份资料的死亡人数和表 1 中 1942 年至 1944 年的关押人数 1484 人、980 人、1023 人计算,1942 年至 1944 年上海盟军战俘营战俘死亡率分别为 1.75%、0.31%、0.78%。^⑨

二、日军对上海盟军战俘营的管理

1941 年 12 月 27 日,美国通过瑞士驻日公使向日本递交信函,表示愿意遵守 1929 年 7 月 27 日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同时也希望日本遵守该条约对待被俘的美军士兵。1942 年 1 月 29 日,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复函瑞士驻日公使以作为对美国的回应,日本

①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3.

② Jim Moran, *Wake Island 1941: A Battle to Make the Gods Weep*, p. 88.

③ 茶園義男:《大東亜戦下外地俘虜収容所》,第 27 頁。

④ 华百纳:《上海秘密战》,第 148 页。

⑤ 《美陆战队被拘人员 将撤往非洲》,《申报》1942 年 6 月 18 日,第 5 版。

⑥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25.

⑦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8.

⑧ 茶園義男:《大東亜戦下外地俘虜収容所》,第 35 頁。在笔者掌握的上海盟军战俘营死亡人数资料中,日方记载死亡人数 40 人为最多,美国战后调查档案提及从 1942 年 12 月 6 日到 1945 年 5 月有 22 名战俘死亡。(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5)

⑨ 表 1 中 1945 年人数是 5 月份战俘迁出上海后的遗留战俘数目,明显少于平时关押人数,故不参与死亡率讨论。

政府承诺：日本虽然没有批准 1929 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不受该公约任何之限制，但处于日方管理下的美国战俘适用于该公约之规定。^①此外，日本于 1907 年 10 月 18 日签字，1911 年 12 月 13 日正式批准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亦对其对待敌国战俘的行为作出了限制。俘虏情报局对盟军战俘的管理参照了 1929 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对战俘问题的一般规定。然而，这种参照是有选择的：只执行那些对其有利的规定，对保障战俘权利的条款，则避而不谈。日方认为掠夺战俘劳动力是符合国际规定的：“利用战俘为工人之决定系以一九二七（原文如此，“一九二七”应为“一九二九”——引者注）年关于战俘待遇之国际条约及一九零七年订定之条例为根据”。^②

根据现有资料，高本（Takamoto）曾在 1942 年 1 月 23 日之后临时管理被押运到上海的盟军战俘；2 月 1 日，“上海俘虏收容所”正式建立，首任所长为汤濑刚一大佐（Yuse）。^③10 月 3 日，汤濑刚一大佐因疟疾性心脏麻痹症死亡。^④大寺敏（Otera）继任所长。因大寺敏留着长长的白色八字胡，战俘们称其为“八字胡汉克”（Handle-bar Hank 或 Handlebars）。^⑤吴淞时期的管理者还包括新藤（Shindo）、秋山（Akiyama）、铃木（Suzuki）和翻译石原勇。迁移到江湾后，管理者包括大寺敏所长、新藤（Shindo）、松井（Matsui）和翻译石原勇。^⑥上海战俘营的管理人员配置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上海俘虏收容所职员表

时间	兵科			卫生部		配属		通讯	合计
	将校	士官以下	军厨	将校	士官以下	下士官	兵		
1942	3	5	2		1			3	14
1943	4	6	2		1			2	15
1944	5	11	2		1			2	21
1945	5	11	2		1		1	2	21（22）

资料来源：茶園義男：《大東亞戦下外地俘虜収容所》，第 25 頁。

注：1945 年上海战俘营中配置人员数目出现差错，括号内的数字是笔者根据前面的数据累加所得。

1942 年 1 月 23 日，“新田丸”停靠于上海公和祥码头。日军精心策划了盟军战俘的亮相仪式——游街示众，并组织上海市民观看。日军要盟军战俘游街示众的目的是为了丑化盟军，借此扫除对英美人士的崇拜，并确立日本必胜的信念。^⑦然而，天降大雨使得日军精心策划的游街示众被迫取消。《申报》报道称：“本市美商人、酒肆俄女与好奇之旁观者，今晨冒濛雨赴外滩与四川路一带希望一睹此辈被俘美兵者，皆失望而返”。^⑧1929 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① 《〈一九二九年俘虜待遇条約〉準用に関する日米日英間往復文章及参考文章（1941 年 12 月 27 日到 1942 年 1 月 29 日）》，《大東亞戦争關係一件/交戦国間敵国人及俘虜取扱振關係/一般及諸問題/俘虜ノ待遇ニ關スル条約關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2032473500。

② 《日本将依法利用战俘选派入工厂工作》，《申报》1942 年 10 月 23 日，第 2 版。

③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22.

④ 《俘虏收容所长汤濑刚一逝世》，《申报》1942 年 10 月 6 日，第 4 版。

⑤ Joseph J. Astarita , *Sketches of P.O.W. Life* ,p. 27.

⑥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 pp. 13, 22.

⑦ 茶園義男：《大東亞戦下外地俘虜収容所》，第 187 頁。

⑧ 《韦克岛被俘美军 拘留沪郊集中营 共一千余名系由横滨来沪》，《申报》1942 年 1 月 25 日，第 4 版。

规定,战俘“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人道待遇和保护,特别是不遭受暴行、侮辱和公众好奇心的烦扰”。^①显然,日方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这也预示了盟军战俘苦难生活的开始。

盟军战俘虽然避免了游街示众,却避不开日军的野蛮对待。日本军方自上而下对盟军战俘都很苛刻。东条英机曾经命令各战俘营长官,对战俘执行最严厉的纪律,“切勿滥用人道观念,并不为对战俘的私人感情所动”。^②据盟军战俘回忆,日本看守“野蛮又愚蠢,经常制造骚乱,他们虐待战俘,战俘管理当局也支持看守们这么做”。^③日军对待上海盟军战俘的态度可从战俘营一次例行训话中窥见一斑:“从现在开始你们身无分文,自从被俘的那一刻起,你们就一无所有了。即使你身体里的那点空气,也不属于你。从现在开始,你们要为大东亚共荣而努力工作,你们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奴隶。”^④

大寺敏长期担任战俘营所长,“他本人或多或少有些仁慈,但他的手下比较粗野和严苛”。^⑤给盟军战俘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石原勇。石原勇战前曾在夏威夷求学,因语言优势担任了上海盟军战俘营的翻译。由于经常毒打、虐待战俘,石原勇被战俘们称为“东方野兽”(Beast of the East)、^⑥“恐怖骷髅”(Screaming Skull)。根据战后审判,我们得知石原勇虐待战俘的原因有二:一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观念的毒害,心里蔑视投降之战俘,“彼生平看不起懦夫,认为在集中营内者,均是无能之辈。彼等既不能到前线作战,自应在后方作苦工”。^⑧二是以虐待战俘来发泄对自己仕途的不满,“该犯自东京到中国时,自负甚高,后来在集中营内得小职位,与士兵同等待遇,内心非常痛苦,故将其不平之气,发泄于战俘身上。每次打人,即引以自荣”。^⑨华北海军陆战队的海军上尉休伊曾加(Huizenga)因寻找工具维修自己的床位,被石原勇打得不省人事,英国驻香港总督杨慕琦也被石原勇用刀架在脖子上威胁过。1946年,美战犯审判委员会审讯石原勇,控诉其“在日人占领上海期间,在吴淞与江湾两集中营充任翻译主任,为虎作伥,对于集中营内之美战犯一千二百名,多方苛待,加以棍打、鞭挞、灌水诸酷刑”。^⑩

吴淞盟军战俘营中“日军守卫对战俘很不友好,战俘经常被抽打耳光。有时因为几个战俘犯错就会导致所有人受罚,战俘营发生过几次大规模惩罚战俘的事情,惩罚措施包括在雨中罚站数小时、几天不供应食物或关禁闭”。^⑪江湾战俘营中,华北海军陆战队战俘参加“地下交易”被发现,日方严厉“审讯”参与者。“审讯”实为水刑和指刑。“水刑”是把战俘捆绑于梯子或木板之上,灌水致其呕吐,反复多次致受刑者肠胃充满水,一整天都不得闭嘴。“指刑”是用绳索套在战俘手指上慢慢收紧,直至骨折或脱臼为止。华北海军陆战队的军医福利少尉(Foley)第一个被“审讯”得不省人事,其余多人拇指被打折,多人遭受水刑。所有参与“地下交易”

① 王铁崖等编:《战争法文献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56页。

② 神吉晴夫等编著:《日本屠杀秘史》,台南:西北出版社,1978年,第62页。

③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18.

④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20.

⑤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6.

⑥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18.

⑦ Joseph J. Astarita, *Sketches of P. O. W. Life*, p. 29.

⑧ 《双方律师激烈辩论 美军三审石原勇 变态心理四字何能洗涤其罪》,《申报》1946年3月7日,第4版。

⑨ 《双方律师激烈辩论 美军三审石原勇 变态心理四字何能洗涤其罪》,《申报》1946年3月7日,第4版。

⑩ 《日战犯石原勇 受美军法庭审讯 充任翻译主任作恶多端》,《申报》1946年3月5日,第4版。

⑪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24.

的战俘被关禁闭一月。

三、盟军战俘在上海的日常生活

吴淞盟军战俘营紧邻黄浦江与长江交汇之处，曾为日军兵营。当盟军战俘到达吴淞之时，战俘营并未修造完备。“院子就像一个鬼屋，四周围着铁丝网，有些地方已损坏了，正在抢着修补。在未修好前，战俘暂时被关押在狭小简陋的平房里”。^①吴淞盟军战俘营环境恶劣，德弗罗上校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地方比吴淞战俘营更加阴冷、荒凉。”^②

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俘所居住的房屋或营棚应具备符合卫生和健康的任何可能的保证。场所应全无潮湿之患，应有充足之温度与光线，对于火灾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③上海盟军战俘营的居住条件远未达到国际法之规定。吴淞战俘营“由7个木质营区组成，除了一个较小之外，其余的均大约210英尺长、50英尺宽。营区里隔成若干小间，每个小间可容纳36人。战俘们就睡在凸起的台子上，营房地面是木质的”。^④营房周围架设电网，后又在营房内部和厕所也架设了一圈电网，整个营区被两道电网环绕以防盟军战俘逃跑。1942年12月，吴淞战俘营遭到中国抗日游击武装的袭击。^⑤1942年12月6日，上海盟军战俘营由吴淞转移到江湾高境庙乡，所有日军官员和看守一同前往。江湾战俘营“几乎是吴淞战俘营的复制品”。^⑥战俘营周围密布电网，邻近电网的是10英尺高的石墙，石墙上面另有一组电网。7个营区大约200码长，每个大约能容纳250名战俘。“江湾战俘营的条件比吴淞战俘营要好得多”，因为“高级军官有独立房间，下级军官根据房间大小2—4人住一间。营房旁有一个裁缝店、一个修鞋店和一个图书馆”。^⑦

盟军战俘在此被关押至1945年5月。根据战俘回忆，战俘营内的日常生活简单乏味：早上起床、点名、训话、整理床铺、呼喊口号；早餐后劳动，部分战俘到战俘营外面劳动，部分战俘在战俘营内执勤、种菜、修补衣物等；中午简单就餐后继续劳动；下午六点晚饭，八点半训话，九点到十一点间熄灯。^⑧日方管控下的媒体宣称这种生活有利于盟军战俘的身心健康：“从前是花红酒绿的生活，现在是每天随着上午七点的起床号声而起床，直至下午九点灭灯，始终与管理员一同工作，继续着规则的生活。”^⑨

上海冬天的湿冷天气成了盟军战俘的敌人。战俘营营房修建简单，时常被战俘们诟病为“偷工减料”之作，根本不能抵御寒风的侵袭。华北海军陆战队战俘穿着冬装，有外套、皮帽和手套，这已足够引起威克岛战俘的羡慕，因为他们被俘之时身着美军夏制式军服，到了上海战俘营也是如此着装。战俘们睡觉的铺盖不能御寒，“战俘们都躺在木板铺就的台子上，每个人领到了一个草甸子，四条毯子，这四条毯子又薄又小，加起来都不及普通美国家庭用毯子的一半

① Reba Wilkerson, "Wake's Forgotten Survivors," p. 45.

②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17.

③ 王铁崖等编：《战争法文献集》，第158页。

④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22.

⑤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29.

⑥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29.

⑦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3.

⑧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p. 221-222.

⑨ 《上海的俘虏收容所》，《三六九画报》1943年第21期，第2页。

保暖”。^①在严寒的冬天，为了抵御寒冷，战俘们不得不将毯子集合起来，四人一组互相抱团以避免被冻死。

“在整个被俘期间，寒冷是极大的苦难，更为困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用以果腹。”^②1942年2月，各地战俘营的日军司令官都接到一项命令：“因为日本重工业工人须要大量食米和大麦，对战争俘虏和被拘平民的配给口粮，应降低至最多不能超过每天四百二十公分（原文如此——引者注）的限度。”^③盟军战俘们回忆在吴淞“吃的是带皮的稻谷、白菜和其他蔬菜做的汤，难得有一点鱼”。^④根据美国战后调查显示，盟军战俘在上海“最初两个月食物非常贫乏，每顿饭只有1小碗米饭、1碗炖菜以及茶”。之后食物供应有所增长，“1942年4月食物配给增加到每人每天650克大米、四分之一磅肉”。再后来，肉的供应中断，偶尔会有鱼（或鱿鱼）。1942年8月，战俘们劳作的菜园开始生产蔬菜，但是“菜园里出产的蔬菜大部分都被日本人拿走了”。^⑤战俘营转移至江湾后，“日本人提供食物比较充足，但是缺乏质量。肉和脂肪的量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质量不佳”。盟军战俘的日常食物包括米饭、蔬菜、少量的肉，另外还有50克的面包和茶，他们要想获得足够的食物，必须听从日方的命令参加劳动。“工作的战俘每天可以领到100%，不工作的战俘得到总量的约80%”。^⑥此外，正如下文述及，盟军战俘还从红十字会和上海英美侨民那里得到了大量食品援助。这些援助对维持盟军战俘的生命发挥了重大作用。

与美国战后调查档案所载“日本人提供食物比较充足”不同，笔者查阅的资料中，既有日方对战俘生活的夸张描述，又有盟军战俘对饥饿的痛苦回忆。1943年3月9日，日方组织记者团参观战俘营，记者们看到的战俘营食物非常丰盛，“三大铁锅菜肉汤，看样子比十六元一客的‘罗宋红菜汤’还有味”。^⑦与此相反，在盟军战俘的回忆录中，饥饿是最常见的词汇。他们记得米饭里面掺杂着众多石块，有时甚至能将战俘的牙齿损坏；所谓的“茶”其实就是柳树的叶子；“炖菜”菜少水多，成了“一种寡淡的汤，没有一点营养”，被战俘们戏谑地称为“东条水”。^⑧自1942年12月6日至1945年5月，江湾盟军战俘营中22名战俘因自然原因死亡。而美国战后调查表明，营养不良是造成盟军战俘患病的根本原因。^⑨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知盟军战俘在上海战俘营中的生活条件极差，维系生命的食物、衣物都得不到充分保证，缺衣少食构成他们在上海日常生活的基本图景。仅够果腹的食物，他们也要以繁重的劳役来换取。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上海盟军战俘营配备了一些医疗器械，这对保障战俘的生命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十字会与旅沪英美侨民也对盟军战俘进行了必要的救助。此外，日军违背国际人道法，强化对盟军战俘通讯事项管理，严控其对外联系的通道，在精神上折磨他们。为了对抗日方的残暴，盟军战俘通过加强自我管理、执行严格的军事纪律而保持自己的尊严。

①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17.

②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18.

③ 神吉晴夫等编著：《日本屠杀秘史》，第155—156页。

④ Reba Wilkerson, “Wake’s Forgotten Survivors,” p. 45.

⑤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23.

⑥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4.

⑦ 刘寒若：《上海英美俘虏营一瞥》，《申报》1943年3月10日，第4版。

⑧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18.

⑨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5.

（一）盟军战俘的劳动

通过强迫战俘劳动实现“以战养战”的战略国策，是日方管理战俘营的重要目的之一。在国际法中，战俘营设置的目的是为安置敌方被俘者，而太平洋战争中日方却将盟军战俘营变成了向“大东亚战争”提供劳动力资源的一种特殊机构。在战俘营中，日军无视国际法对战俘劳动的规定，肆意掠夺战俘身体所能提供的劳动力资源。日军对违反国际法的规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这是对战俘的优待，体现了日本的人道观念。日方控制的媒体宣称：“日本军部当局以东洋民族所特有的慈爱心怀，不但待遇他们极为宽厚，同时为使他们容易度过寂寞的时光起见，给他们一定的劳银，在各地工厂里帮着友邦人士，完成战时下的生产工作。……战事是残忍的，但是对已失掉战斗力的战斗员能给以相当的工作，不视为仇敌，这是人类爱的最崇高的表现。”^① 在日方的宣传中，令盟军战俘痛苦万分的强迫劳动被日方美其名曰“度过寂寞的时光”。

根据1942年5月5日陆军省颁布的《南方俘虏处理要领》，大批被俘的盟军战俘被送往各地战俘营，以满足日军生产扩充及军事劳务之劳动力需求。在吴淞盟军战俘营，盟军战俘承担的第一次大规模劳动是开挖吴淞运河。此工作异常艰难，只能在落潮时进行劳作。战俘回忆说，他们忍受着刺骨的冰水，从事高强度的劳动，日军看守站在附近的高地时刻监视着他们。^② 挖掘运河之外，盟军战俘在吴淞的劳动还包括整修马路、码头卸货、在战俘营空地种菜等。在江湾盟军战俘营，最为艰辛的劳动是参与“富士山项目”（Mount Fuji Project）——在战俘营内修建一打靶场，在日军看守们野蛮监督之下，盟军战俘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高强度的劳动严重摧残了盟军战俘的身体，到1943年夏天，食物短缺加上繁重的劳动使得“战俘们都饿得皮包骨头，一个战俘的腰围瘦了8英寸”。^③

日方档案将盟军战俘在上海的劳役分为“所内”、“土木”、“工业”、“荷役”等不同类型，“土木”作业地点包括“陆军射击场”、“自动军29联队”、“特别情报班”、“中支野战自动军旅”等地；“工业”作业地点包括“中支野战兵器厂”、“中支野战自动军场”等；“荷役”作业地点为“总军货物厂”。1942年盟军战俘在“所内”的累计作业数为10708人次，“土木”项累计作业数2026人次、“工业”项累计作业数78人次、“荷役”项累计作业数5512人次。1943年的统计缺少“荷役”项，“所内”、“土木”和“工业”三项数字分别为3384人次、15045人次、789人次。1944年统计缺少“荷役”项，三项数字分别为8485人次、5173人次、3354人次。1945年的统计缺少“工业”项，“所内”、“土木”和“荷役”三项，分别为4254人次、1100人次和3650人次。^④ 高强度的劳动摧毁了战俘们的身体。盟军战俘体重开始下降，肌肉萎缩。经过繁重的劳动后，战俘们“背向前弯曲，肋骨骨架凸起，腹部向里凹陷，一旦用力，战俘们身上的青筋就全部凸起”。^⑤

1907年10月18日通过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规定，被俘军官不得被强迫参加劳动，并且“应获得拘留地国同级军官所享有的军饷”。^⑥ 根据美国战后调查，

① 《英美俘虏的“勤劳作业”》，《三六九画报》1942年第18期，第2页。

② Joseph J. Astarita, *Sketches of P. O. W. Life*, p. 24.

③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31.

④ 茶園義男：《大東亞戰下外地俘虜收容所》，第29頁。

⑤ Reba Wilkerson, “Wake’s Forgotten Survivors,” p. 45.

⑥ 王铁崖等编：《战争法文献集》，第51页。

在上海盟军战俘营中,上校军衔的战俘按规定每月可获得312.50日元,中校为230日元,少校为170日元,上尉为127.50日元,中尉为85日元,少尉为70.83日元;在这些收入中,每月要扣除60日元的基本生活费用,其中包括食品42日元、服装15日元、设备和电力3日元,结余部分必须以汪伪政权“中储券”兑现。^①然而,以上待遇只有在被俘军官“自愿参加劳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如果有军官拒绝自愿工作,他们的食品配额会被削减,而且还会受到其他的惩罚。”^②

东条英机曾向各战俘营发出“没有工作,就没有食物”的命令。^③日方强迫盟军战俘劳动,而参加劳动又是普通战俘获取报酬、维持生命的唯一途径。“陆军省昨日公报书中载令、订定办法,以利用被禁日本各地之战俘入重要工业充半熟练工人,此辈战俘将受严密检验,以定其技术及已往工作成绩等,然后选派入工厂工作”。^④日方管理者将上海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分成两类:技术类战俘与普通战俘。在江湾战俘营,技术类战俘月收入27元“中储券”或者5日元,普通战俘月收入15—20元“中储券”。^⑤根据战俘们的回忆,这些收入只是数字,由于“中储券”快速贬值到“几乎毫无价值”,所以战俘们实际收入非常低,“战俘工作三天能买十根香烟,或者一小包日本面包”。^⑥

(二) 盟军战俘的医疗保障状况

战俘的生命维系与战俘营内医疗卫生状况密切相关。战俘营内关押战俘密度大,加之饮食待遇差、劳动强度大等客观原因,造成盟军战俘身体素质低下,缺乏抵抗力,故很容易爆发大规模流行病疫情,从而造成大批量战俘死亡。由于日军虐待盟军战俘,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战俘的整体死亡率高达27%。^⑦具体到设立于中国的盟军战俘营,有研究证明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16%。^⑧

根据笔者前文讨论,1942年到1944年间,上海盟军战俘营内盟军战俘年度死亡率未超1.75%,这个数字低于日军设置于他处的盟军战俘营。笔者认为,死亡率较低同该战俘营具备基本的医疗条件相关,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战俘营配备了少许必需的医疗器械。战俘营“医疗补给由日方供应,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也捐赠了大量医疗器械”,故“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满足需要”。^⑨1942年10月大寺敏接任所长后,战俘营管理当局允许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疗援助,“通过红十字会捐赠,战俘营设置了一个实验室、一个X光室、一个医务室和一个牙科室”。^⑩红十字会捐赠的这些基本医疗设施成为日方宣传其“人道”的资本。日方组织上海及其

① Walter Rundell, Jr., “Paying the POW in World War II,” *Military Affairs*, vol. 22, no. 3 (Autumn 1958), p. 133;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7.

②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6.

③ 神吉晴夫等编著:《日本屠杀秘史》,第156页。

④ 《日本将依法利用战俘选派入工厂工作》,《申报》1942年10月23日,第2版。

⑤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7.

⑥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29.

⑦ Charles G. Roland, “Stripping Away the Veneer: P. O. W. Survival in the Far East as an Index of Cultural Atavism,” p. 79.

⑧ 杨竞:《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考略》,《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01页。

⑨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5.

⑩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23.

周边地区的媒体记者探访战俘营，之后记者写道：“医院设备太好了，在上海除了公立大医院之外，恐怕很少有比这儿完备的。特制的避音墙壁，有 X 光室，太阳灯室，手术室，药剂室，诊疗室，齿科诊疗，化验室，还有其他医疗上的设备，一时亦记不胜记，就凭这一点，海上的医院，有几家能比得上？”^①这种报道不无夸张之处，但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与其他盟军战俘营相比，上海盟军战俘营的医疗条件相对较好。日方将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的人道救助当作善待战俘的宣传资料，以此来欺骗舆论，塑造自己的“文明”形象。二是盟军战俘医务人员尽职尽责。上海盟军战俘营医疗事项由日军医务官新藤总体负责，相比石原勇等管理者，他给战俘们留下的印象较为友善。“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对于战俘营中的盟军医务人员比较友好，对战俘报以理解和同情”。^②此外，新藤还有一些帮手——被俘的盟军医务人员。“盟军战俘中的医务人员自始至终从事医疗救助活动，他们的病人是那些因为挨饿、挨打、过度劳动而引起营养不良、身体孱弱的盟军士兵”。^③华北海军陆战队的 200 余名战俘包含 3 位医务军官、11 位普通军医，共计 14 名医务人员。来自威克岛的战俘中也有数名医务人员。例如，约翰·佩斯（John N. Pace）在威克岛被俘时身份是受雇于太平洋海军基建队（Contractors Pacific Naval Air Bases）的医务人员。这些人在进入战俘营后继续履行医务人员的职责。

日军将战俘中的医务人员能够继续从事医务活动看成是对盟军战俘的优待，同时也是对这些军医战俘的优待。“在日军设置的盟军战俘营，战俘中的医务官可以继续行使医生的职责，这被日本人看作是格外开恩”。^④在上海盟军战俘营，医疗保障工作由战俘中的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具体负责，该医疗队的负责人是希森（Thyson）上尉，他是上海战俘营中级别最高的美军医生。此外还包括 4 名医务官（2 名美国海军医生、1 名英国医生和 1 名意大利海军医生）和 3 名陆军男护理。^⑤医疗队将战俘营需要的药品名录告知新藤，新藤采购医疗用品。此外，他们还还为盟军战俘接种霍乱、痢疾、伤寒和天花疫苗。战俘营从吴淞搬迁到江湾过程中，军医战俘们不计个人辛苦，将所有医疗器械带到新址。

红十字会提供的医疗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战俘营中配备的医疗设备实在有限，“药品和医疗救助设施极其缺乏”。^⑥尽管盟军战俘医务人员尽职尽责，希森上尉想尽各种办法寻找药品以维持战俘营内的医疗系统，^⑦但是战俘营内医疗条件仍然非常差。战俘营内医疗设施异常匮乏，非但没有“避音墙壁”，战俘营的医院“只有几间空屋子，没有床位，没有专门规划，只是将战俘住的地方重新划分隔离出几个铺位而已”。^⑧1943 年江湾战俘营进行“富士山项目”之时，江湾战俘营内爆发了肺结核疫情。希森上尉试图说服日方管理者将结核病患者隔离开来，让患病

① 刘寒若：《上海英美俘虏营一瞥》，《申报》1943 年 3 月 10 日，第 4 版。

② John N. Pace, “Released from a P. O. W. Camp,”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 vol. 46, no. 1 (Jan. 1946), p. 56.

③ Rosalind Hearder, “More Complex than a Stereotype: Australian POW Doctors and the Japanese in Captivity, 1942-45,” pp. 75-76.

④ Charles G. Roland, *Long Night's Journey into Day: Prisoners of War in Hong Kong and Japan, 1941-1945*, p. 93.

⑤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p. 14-15. 1943 年 9 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这样意大利就从日本的盟国变成了敌国，故有意大利战俘被囚禁于此。

⑥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23.

⑦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23.

⑧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4.

的战俘停止劳动、完全休息。然而，他的呼吁没有丝毫作用。“我们仅能做到这些，我们的医生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来抑制病情，虽然作为大都市的上海完全有能力拥有这些设备”。^①

（三）红十字会与旅沪美英侨民援助

盟军战俘在上海战俘营历经磨难，食物衣物短缺、管理者残暴等都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严重威胁。然而，正如前文述及，盟军战俘在上海的死亡率低于日军设置于他处的盟军战俘营，这与他们得到了红十字会与旅沪美英侨民的鼎力资助密切相关。

太平洋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会关注战俘事宜，曾经致电各交战国，呼吁各国善待战俘，要求“各交战国或关禁者，不得采用任何报复行为”。^②国际红十字会对关押在上海的盟军战俘亦颇多关照，多次同战俘营管理当局就援助之事进行协商。“开始时候，战俘营不允许红十字会涉入。大寺敏上任之后，红十字会才被允许接济战俘衣物、药品和食品”。^③通过红十字会，大量的食品、药品、衣物等被陆续送至上海盟军战俘营。自1942年10月始，国际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于每月10日、25日定期向战俘营运送给养物资。除了集体性的慰问，单个的红十字会包裹也被陆续送至战俘营，在江湾战俘营关押期间，每个盟军战俘平均获得了约15个食品包裹。^④此外，“红十字会还送来了一些猪，于是战俘们开始饲养牲畜，战俘营里一度拥有24头猪。山羊和兔子也不时被送来”。^⑤这为盟军战俘提供了一些肉食，改善了战俘的营养状况。

每逢节日，红十字会还对盟军战俘施行特别慰问。1942年圣诞节，平均每位盟军战俘收到了17.5个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包裹，“这些包裹里面有食物、药品，正是这些东西救了战俘们的性命”。^⑥1944年圣诞节，国际红十字会给盟军战俘们提供的“圣诞晚餐”包括蔬菜汤、烤肉罐头、煮山芋、胡萝卜、蛋糕卷、咖啡和南瓜饼等。^⑦盟军战俘利用这种特别慰问的机会补充营养，增强体质，从而使得自己能够在残酷的战俘岁月里存活下来。

国际红十字会配送的给养物资遭到日方管理当局的盘剥。日本宪兵总是进行压榨，不是所有的包裹都能抵达战俘营，即使收到，也往往已经被搜刮过。^⑧上海盟军战俘营内截留红十字会给养物资的行为一度盛行，甚至连战俘营所长的办公室里也出现了标有红十字会标志的食品。盟军战俘坚决抵制日本守卫私盗给养物资的行为。“国际红十字会在每个包裹上列出了物品清单，并且要求有收条”。^⑨因为日方私自截留给养物资，战俘营内盟军最高长官阿什赫斯特上校拒绝在红十字会清单收条上签字。没有盟军战俘的签字回执，日方没有办法向国际红十字会回复，盟军战俘用这样的方式同日方看守的偷窃行为作斗争。

日方守卫想尽办法盘剥盟军战俘获得的各种捐助。1942年6月，《申报》记载日方规定盟军战俘获得的个人援助“惟须用军票，每次不得超过十元”。^⑩美方档案中对此记载更为详细，“战

①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31.

② 《国际红会呼吁优待战俘 要求交战国遵守条约》，《申报》1944年1月9日，第2版。

③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23.

④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5.

⑤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p. 15.

⑥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24.

⑦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4.

⑧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5.

⑨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5.

⑩ 《外侨与美战俘 实行通信 包裹亦可递寄 概由红会代办》，《申报》1942年6月10日，第4版。

俘们收到的捐赠被限定在每人每次 10 日元，每月不得超过 20 日元。1943 年，当 1 日元兑换 5.55 元‘中储券’时，战俘们接受的捐助只能兑换成‘中储券’。^①盟军战俘所接受的“捐赠”多为外汇，在外汇转换为“军票”、“中储券”的过程中，日方管理者不按市场价格操作，从中渔利颇多。

旅沪英美等国侨民也向上海盟军战俘提供了诸多帮助。“我们缺衣少食，但是如果没有在沪英美侨民相助，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困难”。^②英美等国侨民尽全力对战俘提供资助，其中的一位珀西女士（Percy Shelley Widdup）被战俘们亲切地称为“蜜蜂阿姨”（Aunt Bee）。这位女士资助了 14 位威克岛战俘，每当她来集中营给 14 位“亲戚”送食物和衣物的时候，日本守卫为她所带的大大小的包裹之多而感到惊讶。^③

学者对奉天盟军战俘营的研究指出，被关押在沈阳的盟军战俘在运抵初期死亡率最高。英国战俘罗伯特·皮蒂少校的日记记载：1942 年 11 月 11 日到达沈阳当天就有一名美国战俘死亡，至 1943 年 4 月 5 日，在 151 天内共有 201 名战俘死亡。^④盟军战俘经历残酷的海上转运之后，身体消耗极大，急需休养生息。如果此时得不到有效救助，死亡率会很高。对比沈阳盟军战俘营的状况，上海盟军战俘有幸得到盟国侨民的援助。旅居上海的国际侨民对保全战俘生命发挥了极大作用。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大量英美侨民聚居的国际城市，最早对盟军战俘进行救助的正是在沪英美侨民。当盟军战俘还被关押于吴淞之时，英美侨民的捐助活动就已经启动。他们在“上海美侨联合会”之下设立“战俘救济委员会”，呼吁旅沪侨民为盟军战俘捐赠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这一呼吁得到上海英美侨民的积极响应。1942 年 4 月初，战俘救济委员会将第一批物资送往吴淞盟军战俘营。这批救济物资包括“食品衣衫卫生用具读物与运动器具等一二八六件，内以衣食两项占大宗，他如纸烟与肥皂亦有少许，并有棒球用之棒球与手套等，食品项中从朱古律糖与果酱以至肉类等，更有捐赠阿司匹灵片咖啡牛乳与牛油等，他如书籍四十八册，杂志与谐画八十九册，以助美俘消遣”。^⑤这些捐赠从物质和精神上有助于盟军战俘度过苦难的战俘生活。

1942 年 4 月下旬，英美侨民为盟军战俘募集了第二批物资。“自衬衣鞋帽以至牛乳饼干等，种类繁多，共一一三九件半，所以有此半数者，乃因袜子计二十九双半故也。各类物品，以食物占数最多，无论牛油、肉类与罐头菜，色色俱全，良以在现况之中，食物乃最为重要，必将予被拘禁之美俘以绝大之满意也。衣着一项亦颇注重、其中毛巾不下四百四十九条，他如睡衣、枕套等亦齐备，更有肥皂、书籍与纸牌等杂项，设想可谓周到”。^⑥1942 年 7 月份的捐助中仍然以食物为大宗，尤其是以蔬菜占据主要份额。“内中最笨重者，为英侨联合会所赠之番茄一千八百磅，及圣经等数百册，其他物品，自牛肉以及乒乓台，种类繁多，荷兰侨民捐赠之物亦夥，有纸烟七千四百盒，卫生用品、衣服食物及留声机唱片等”。^⑦这些援助如及时雨般改善了盟军战俘的生活条件，有利于他们的生存，从而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能活到胜利时刻的到来。

①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6.

②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23.

③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23.

④ 杨竞编著：《奉天涅槃：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盟军战俘营》，第 41—42 页。

⑤ 《美侨联合会 救济美国战俘 亲友函件不得封口》，《申报》1942 年 4 月 3 日，第 4 版。

⑥ 《赈济美俘委会 递第二批物品 前日有十二人获准出营》，《申报》1942 年 4 月 28 日，第 4 版。

⑦ 《英美侨对战俘大量接济》，《申报》1942 年 7 月 26 日，第 4 版。

(四) 盟军战俘的通信事项

盟军战俘被移到江湾战俘营之后,其生活能够得到基本保证。然而,“有了食物能让我们活下来,但是没有家里的消息使我们感到同饥饿一样难受。在战俘营里,没消息就如同坏消息。大家开始胡思乱想、捶击脑袋、担心、忧郁。就这样,战俘在保持勇气之战中成了失败者”。^①上海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迫切需要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让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并且希望获知亲人的消息。

根据现有的资料,盟军战俘在抵达上海的半年内只能接收发自中国的信件,没有同母国联系的记录。盟军战俘可以与居住于中国的友人互通信件,“日当局且以上海与华北方面亲友发出之函件,送交战俘,惟此等函件,不得封口”。^②1942年下半年,日方才允许盟军战俘向家中写信,并且对书信形式作出了特别限制——“可以写信,但是要用日本人事先给出的模板”。^③战俘营管理当局对信件数量亦有规定,“依照目前之暂定办法,各俘虏仅能于每三个月内寄发作覆之信一封与明信片两纸,惟不久可望获得战俘与共亲友多通音讯之许可,复据国际红十字会驻沪代表依格尔解释称,本市侨民寄与一个战俘之信件,亦两封为限”。^④当月战俘营中2600封信件将被带回美国。^⑤然而,盟军战俘并没有得到“与共亲友多通音讯”的许可,反而通信数量被一再削减。“战俘被允许每月写一封一页之信,或者寄出两张明信片,两者选其一。后来,除非得到特别允许,每个战俘每季度只能写一张明信片”。^⑥自1942年9月始,盟军战俘开始收到由国际红十字会转交的家信。笔者还发现了一张由纽约寄往上海盟军战俘营的明信片,收信人是关押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乔治·牛顿(George R. Newton)少尉。^⑦

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俘营“检查邮件应迅速办理”。^⑧然而,日方对战俘的来往信件采取拖延发放的做法,信件“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抵达战俘营”,^⑨日本人通常将信件截留一段时间。这样的做法“对战俘营的人是一种折磨。战俘们在战场上英勇奋战,但是因为没有收到家里的信而哭泣,备受折磨的战俘们躺在床上整夜望着天花板,试图不让自己瞎想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⑩更令盟军战俘们愤恨的是“日本人经常拆开信封审查信件,许多时候在战俘不知晓的情况下,他的来信就被管理当局没收了”。^⑪

如前文述及,战俘的信件往来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上海委员会执行。如1942年6月10日《申报》刊登消息称,“国际红十字会驻沪委员会昨晨宣布,本市侨民今后可于每月十日与廿五日,

①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24.

② 《美侨联合会 救济美国战俘 亲友函件不得封口》,《申报》1942年4月3日,第4版。

③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24.

④ 《外侨与美战俘 实行通信 包裹亦可递寄 概由红会代办》,《申报》1942年6月10日,第4版。

⑤ 《美陆战队被拘人员 将撤往非洲》,《申报》1942年6月18日,第5版。

⑥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6.

⑦ <http://xiwangshenzhou.blog.163.com/blog/static/16925930720141274413541/>.

⑧ 王铁崖等编:《战争法文献集》,第164页。

⑨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 16.

⑩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p. 224-225.

⑪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24.

以包裹与信件寄交被拘禁于江湾与吴淞之美战俘，第一批将于六月二十五日送出”。^①1942年7月26日，《申报》报道：“圆明园路九十七号国际红十字会于今（二十五日）晨运出大批物品与邮件十五袋，用特大卡车一辆载过苏州河，送交此间之英美战俘……今料红会将于下周初接获英美战俘发出之下批邮件，查各战俘准许每三个月发出一函与两明信片。”^②由以上资料可知，红十字会将来自盟国的信件送交战俘营，日方审查之后将部分信件交给战俘，部分信件被扣留甚至销毁。战俘寄出的信件经过战俘营检查之后统一移交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再送交战俘家庭。

（五）盟军战俘的纪律与自我管理

盟军战俘在上海关押期间执行了较为严格的军事纪律。“上海盟军战俘营相对较高的生存率，主要原因在于其被俘之时较好的身体素质，得益于他们被幸运地关押于上海，得益于战俘营中严格的纪律及彼此关心的战友之情”。^③日军对上海盟军战俘营的管理既苛刻又野蛮，故“战俘要靠个人的力量、要靠内部的管理去面对突然到来的物资等方面的短缺”。^④在战俘营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战俘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个人生活空间极其有限，个人尊严被肆意践踏，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为了生存，战俘们不得不努力争取更多的资源。在整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矛盾就容易产生，由小积大则成冲突，战俘之间发生冲突亦为平常之事，日方也试图利用这些冲突强化对盟军战俘的管理。日方的图谋被盟军战俘所洞察，他们认为“维持军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整体来对抗日本人的图谋”。^⑤为了消除战俘间的矛盾，使战俘保持集体观念，盟军战俘在上海关押期间执行了较为严格的军事纪律。盟军战俘坚持军事化管理，一切事项按照未被俘时处理，士兵见到长官要敬礼。这就出现了一群食不果腹、破衣烂衫的盟军战俘见到长官依然坚持敬礼的场景。敬礼是一种仪式象征，不仅展现了盟军战俘的精神面貌，并且给战俘以精神寄托，使之感受到集体的存在。

由于战俘们被俘前所属组织不同，加之日方管理者分化管理、挑拨离间，即使战俘营强调纪律，也很难做到完全一致。在上海盟军战俘营中，华北海军陆战队战俘被关入上海战俘营之时保留有较多个人财产。在“富士山项目”修建中，中国劳工进入战俘营劳动，盟军战俘终于找到可以合法出入战俘营的非日方人员。华北海军陆战队战俘将自己持有的美元同中国劳工交换，逐渐形成了一个地下市场。日方知情后进行查处，大部分盟军战俘虽遭受严刑拷打仍不出卖战友。然而，也有战俘向日方告密，最终使得日方摸清了地下市场的详情。参与地下交易的战俘被关禁闭一月。这些同日方合作的战俘被称为“白老鼠”（white mouse），并被其他战俘所孤立。“这些人因为告密而获得了实际好处，他们在战俘营中的地位上升，但是其他的战俘再也不同他们说话了”，^⑥战俘以这种方式孤立了那些破坏纪律、出卖战友的人。

① 《外侨与美战俘 实行通信 包裹亦可递寄 概由红会代办》，《申报》1942年6月10日，第4版。当时，上海盟军战俘营仍设于吴淞，文中所涉及的“江湾”并非指本文研究的“江湾盟军战俘营”。1942年6月，日军在提篮桥监狱、华德路监狱关押有少量战俘。这两个地区都在“江湾”范围之内，此处的“江湾”指这两处盟军战俘关押地。

② 《英美侨对战俘大量接济》，《申报》1942年7月26日，第4版。

③ Barton J. Bernstein, “The Pacific War Revisited by Gunter Bischof, Robert L. Dupon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67, no.4 (Nov.1998), p.643.

④ Charles G. Roland, “Stripping Away the Veneer: P. O. W. Survival in the Far East as an Index of Cultural Atavism,” p.79.

⑤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225.

⑥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p.230-231.

盟军战俘在上海身陷囹圄，经历身体、心理的双重煎熬，正是严格的纪律使得绝大部分战俘战胜了苦难。“我们有一个保持自己尊严的强有力武器——在战俘营中保持严格的军事纪律，这是我们保证自己是军队而不是暴徒的唯一途径……只有保持军事纪律才能让我们在维持道德中度过那些苦难之年”。^① 上海的盟军战俘由于保持了自我军事化管理、执行了严格的纪律，才将战俘凝结成一个整体，以整体的力量去面对苦难，使得大多数战俘最终迎来了自由。

结 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000余名盟军战俘被陆续运送至上海盟军战俘营。依笔者所见，日军设置上海盟军战俘营，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则可以就近安置上海、华北等地被俘的盟军士兵；二则可以在中国民众面前丑化盟军，瓦解中国人对英美等国的崇拜，放弃对英美等国援助抗日的期望；三则可以为上海的驻军提供劳动力资源。盟军战俘在上海历经三年余战俘生涯，他们备受折磨，命运多舛。1945年5月，这批盟军战俘先被移送至北京丰台，后又被转移至朝鲜半岛的釜山，最终在北海道被美军解救。

由于地处国际都市上海，且上海各界市民和团体非常关注，日方刻意将上海盟军战俘营建设成为展示其文明形象的橱窗，作为示范典型广邀记者进行宣传报道。无论是医疗设备“海上的医院，有几家能比得上”，还是战俘的饭食比“十六元一客的‘罗宋红菜汤’还有味”，都显示出日方欺骗舆论的本质。日军还允许盟军战俘建立图书馆、打乒乓球、下象棋、看电影宣传片，战俘死亡时候允许演奏丧葬音乐，也只是日方塑造自己“文明”形象的手段。^②在盟军战俘的回忆中充满了寒冷、饥饿、酷刑与强制劳动。盟军战俘的回忆与二战中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的形象一致，“虽然关押于德国等其他轴心国国家的盟国战俘也很不幸，但是被日本收押的盟军战俘是这些不幸中最为不幸的那一个”。^③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关押盟军战俘132134人，死亡35756人，死亡率高达27%。其中澳大利亚战俘死亡率为34%，美国战俘死亡率为33%，新西兰战俘死亡率为26%，英国战俘死亡率为25%，荷兰战俘死亡率为23%，加拿大战俘死亡率为16%。^④中国战俘在华北几个大型战俘营中的死亡率达到40%，押到日本的战俘劳工死亡率是17.5%，有的作业场达65%，押到伪满的一些劳工作业地，死亡率高达40%。^⑤然而，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论述上海盟军战俘营较低的死亡率得益于战俘营内基本医疗设施的配置、盟军战俘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红十字会及旅沪侨民的资助、盟军战俘保持严格纪律等，这些因素使得更多的盟军战俘能够活着走出战俘营。日军刻意将上海盟军战俘营打造成善待战俘、遵守国际法的典型，并不能掩盖其虐待战俘、践踏国际法的罪恶行径。

关于日军对盟军战俘的虐待，“许多人将这归因于基于武士道传统的日本军事伦理，武士道

① James P. S. Devereux, *The Story of Wake Island*, p. 225.

② Prisoner of War Camps in Areas other than the Four Principal Islands of Japan, pp. 17-18.

③ Rosalind Hearder, "More Complex than a Stereotype: Australian POW Doctors and the Japanese in Captivity, 1942-45," p. 75.

④ Karl Hack and Kevin Blackburn, "Japanese-occupied Asia from 1941 to 1945: One Occupier, Many Captivities and Memories," in Karl Hack and Kevin Blackburn, eds., *Forgotten Captives in Japanese-Occupied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Taylor & Francis), 2008, p. 4.

⑤ 何天义主编：《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4页。

要求所有的士兵绝对的忠诚，鄙视投降，把投降看成是丢脸的事情。对待自己这样，对待敌方士兵也是如此”。^①由于日本的文化传统及军国主义的盛行，二战时期的日本军人“被灌输投降是罪恶的观念，所以蔑视和憎恨俘虏，常常虐待和杀害敌方俘虏。战后，有不少旧军人因‘虐待俘虏’罪被送上国际法庭接受审判，并作为战犯被处以死刑”。^②东京审判起诉书中第 54 项“控告命令、授权和准许惨无人道地虐待战俘和被拘留平民”、第 55 项“控告罪恶地不设法保证遵守对待战俘和被拘留平民的规则，或不设法制止对战俘和被拘留平民所犯的战争罪行”均涉及虐待战俘问题。^③在审判中，被判处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中至少被控告此二项之一有罪。^④上海盟军战俘营最高长官大寺敏因“违反战争规例，对拘禁之盟国人民加以虐待”而“处有期徒刑七年”。^⑤野蛮对待战俘的“东方野兽”石原勇被判决无期徒刑，并服劳役终身。^⑥

战俘是受到战争影响的重要群体之一。一个国家对待战俘的态度亦体现其文明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待盟国战俘异常残暴，即便日方刻意将上海盟军战俘营打造成为展示其遵守国际人道法、善待战俘的橱窗，但是该战俘营仍然充满着暴力与罪恶。日本应深刻反思其侵略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作者张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讲师。上海 201620；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 200233〕

（责任编辑：荣维木 王亚红 责任编审：路育松）

① Clifford G. Holderness and Jeffrey Pontiff, "Hierarchies and the Survival of Prisoners of War during World War II," *Management Science*, vol.58, no.10 (Oct. 2012), p.1875.

② 松本一男：《中国人与日本人》，周维宏、祝乘风译，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 年，第 69 页。

③ 胡菊荣：《中外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关于南京大屠杀》，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90 页。

④ 七名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中，木村兵太郎、武藤章被判第 54、55 项两项有罪；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三人被判第 54 项有罪，55 项不作判决；广田弘毅和松井石根被判第 55 项有罪。

⑤ 《三日战犯审判 一长监二徒刑》，《申报》1947 年 7 月 27 日，第 4 版。

⑥ 《闻判神色沮丧 日战犯石原勇判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并服劳役》，《申报》1946 年 3 月 8 日，第 3 版。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se of Hankou Port Liu Litang and Song Shilei(61)

The rapid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tea in early modern times is a striking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China's society and economy impatiently awaited transformation,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is rise and fall have become a focus for scholarly exploration. Views on the subject fall into four categories, but rarely include discussion of the basic mechanisms of market transactions. We propose to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symmetry of market information, using Hankou Port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The various type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found in the Hankou foreign trade tea market made the different entities involved adopt risk-averse trading systems and measures, thereby reducing losses due to information asymmetry. However, this sowed the seeds of the decline of foreign trade in the Hankou tea market. In response to the market impact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market trading entities adjusted thei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English quickly shifted their trading focus; other foreign merchants transferred risk by banding together to manipulate the market; the Chinese mobilized collectively to maintain the trading order; and the Russians ultimately monopolized the market. The foreign trade tea market withered on the vine as a result of market failure, with government regulation having a negligible effect.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Japanese POW Camps for Allied Prisoners in Shanghai

Zhang Shuai and Su Zhiliang(78)

The Japanese established the POW camps for Allied prisoner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Pacific War in order to manage the POWs and eliminate the hope of the Chinese to get help from Britain, the US and other Allied countries during the war,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provide labor forces for the Japanese in Shanghai. From January 1942 to May 1945, more than 1000 Allied POWs from Wake Island battle, North China Marines, etc., were imprisoned for over three years in these camps and suffered cold, starvation, tortures, slave labor and so on due to the Japanese inhuman treatment. Despite its poor living conditions, the death rate in the camps was relatively low, owing to the existence of basic medical facilities, the enthusiastic support from the Red Cross and the expatriates in Shanghai, as well as the strict discipline of the POWs themselves. The Japanese intended to make the camps showcases displaying its "kindness" to POWs; but, on the contrary, they turned out to be evidence about Japanese inhumanity and war crimes.